

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

来源：英特网 时间：2005-4-17 7:11:38

钱冠连

摘要：中国哲学之所以未走上细密的语言分析之途，原因是：第一，“中国哲学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因此不迫切需要符号帮助。第二，中国哲学走向了人文精神、人生体验与内心领悟，以令人吃惊的固执态度拒绝诉诸语言与文字。第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曾从汉语形式中求解过。西哲走上语言分析之路是由于：第一，解决语言问题就是解决哲学问题；第二，西哲与逻辑以及严密的形式论证捆绑在一起，不能分开，于是必然求助于符号，语言是符号；第三，西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诸是，所是，存在”就是从西方语言中盘旋出来的。结论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西哲重形式与逻辑，中哲重体悟；在研究对象上，西哲重存在，中哲重人生。

关键词：语言走向，重形式与逻辑+重存在，重体悟+重人

On the Interflow of Sino-Western Philosophy with Language

The reason why the linguistic turn which had happened to western philosophy [2] did not happen to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is that the former has heavily been dependent on form-and-logic, but the latter on apperception. The former is involved in the belief that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ought can be attained through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language. It has ever been entangled closely with a formal logic and meticulous forms, while its main questions—ont- / being, object, and so forth— to be answered arise from languages of the West.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however, need not seek help from language analysis, because its essential spirit is introspective, apperception-dependent, and lies in seeking innermost being about human life. Therefore, its main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have not 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linguistic turn, form-and-logic-dependent + being-centric, apperception-dependent + human-centric

西方哲学走向了细密的语言分析之途。中国哲学虽然与语言有过遭遇，却远远未曾深入语言分析。这是为什么？

1.1 中国哲学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关于哲学中的语言障碍，冯友兰（1996：13）指出：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冯还指出，由于中国哲学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出发点，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它不很明晰，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富于暗示，不必明确（1996：22—23）。按说语言不很明确又要明确地找准思想，理应加强分析才是符合逻辑的，而中国哲学为什么放任这种“不很明确”的状态而不求助于语言分析呢？这不是有点奇怪吗？窃以为，这正是中国哲学与语言关系的神秘之处。解开这神秘，要看中国哲学史上名家、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的作为，尤其要看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下面将要讨论）[3]。

1.2 中国哲学的精神以令人吃惊的固执态度拒绝诉诸语言与文字。我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结论，是基于如下事实。

第一，从中国哲学的精神中看不出有诉求语言文字的任何要求。

现在，我们以冯友兰所述之“中国哲学的精神”来谈中国哲学的精神。以一人之哲学精神来代表一国之哲学精神，是要有充分的可行性的。我这样做的理由有四：一，“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 [4]，二，“他是少数几位思想自成体系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之一” [5]；三，大多数中国学人认为他的哲学著作可以代表中国哲学的精神。陈寅恪在评论三十年代出版的冯著《中国哲学史》时指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6] 四，“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7] 在以下引述中，黑体是我所设。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1996：6—9）

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关于入世和出世的哲学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这个，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

我的评述：养成一种人格，是不需要求助于符号表达的。

《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之目录部份（冯友兰 1998）

“从世间与出世间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中国哲学求一种最高境界，但又是离不开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泰戈尔讲的是一元论，中国旧说是二元论。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西方是外向的，东方是内向的，西方强调我有什么，东方强调我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一种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想到需要内心的和平与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对人生启示的就只是这个公开的秘密。它不过是将人生当作一个自然的事实，努力在精神上改进它，以求使之尽量地好。中国若能对未来世界哲学作出贡献，那就是这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日常生活之内实现最高的价值……。西方哲学中有神秘主义而不够神秘，中国哲学则逻辑分析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哲学的特质”：人生的矛盾归结起来两大类，解决的办法有三条路。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非常高明而办法却非常平凡，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不平凡的事，也可以说，在平凡的生活过不平凡的生活。

“对中国哲学的两个总结”：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新原人”：现在西方哲学家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没有回答，甚至没有企图回答人们心中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例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类问题。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一）（二）”：学哲学可以养成清楚的思想；学哲学可以养成怀疑的精神；学哲学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学哲学可以养成广大的眼界，我们要有这种眼界，不但可以作事，而且更能作事。

“三松堂全集”（这个题目不在目录之内）：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 [8]。

我的评述：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是人伦日用，是人的今生”，追求精神上的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以哲学的诉求而论，“东方是内向的”，中国哲学指明人“需要内心的和平与幸福”，“它不过是将人生当作一个自然的事实，努力在精神上改进它”，这种种追求，都是内向。内向的精神寻求不要求助符号表达，需要的倒是反面：长时期的内省。“中国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这就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一种和逻辑不大相涉的研究方法，可以不必迫切地需要符号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一个靠直觉和体验发展起来的哲学还需要严密的符号语言表达吗？中国哲学钻进了心性，心性仿佛是一座大的迷宫，哲学到了这里被迷住，不再愿意出来。心怀与人文精神都不迫切地需要符号表

述的帮助，因而无须走向语言分析。

第二个事实是，禅宗的根基在“渐修与顿悟”，拒绝求助于语言文字的。禅宗中有许许多多公案（近于故事，可惜本文因篇幅不能列举）用种种极不寻常的方法提醒人们注意：人为的语言文字并不是真实本身，不能用它们去谈论、思考和接近真实的本体。胡塞尔（Husserl）在《现象学的观念》中指出：“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论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像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观明晰性。”这个意思是说，用语言所表述的论证（哪怕是科学论证），不会使没有根据发生的真实本体发生。相反，语言却肢解和遮蔽了“概念化之前的世界”。禅宗所提倡的正是不经过逻辑思维的过滤，在直觉中与世界打成一片。“真理与文字不是一回事，真理有如天空的明月，文字则是指月的手指”（六祖慧能）；禅宗避免了逻辑、语言对世界的斫伤。语言表述要给周围的事物都贴上一个标签，似乎人生只是哲学的、逻辑的、科学的；其实生活更多一些心理的体验成份。文殊师利甚至感叹“连文字都没有了，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指消灭对立面，对论题两方面都不执着，属于以言遣言。维摩诘则索性对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无言无说，达到佛的最高境界。胡适当年与铃木大拙讨论禅宗，曾谈到他们二人都是禅的罪人，因为他们用文字论禅，禅也就消失了。铃木大拙也同意胡适的话。“道”是无所不在的，它明明白白，一目了然，正如门、窗、壁，一见就知道，根本用不着文字的说明，逻辑的阐释。一旦加入了概念的追究，“道”便消逝了。斐休曾将对禅的理解写成文章，出示希运，希运一眼都不看，说“若形于笔墨，何有吾宗？”[9]或许有人以为，禅宗这种坚决拒绝语言文字表述的态度，不能代表中国哲学，至少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我以为，如果拆去禅宗这一块，中国哲学就会有栋折榱崩之虞。禅宗的存在是中国哲学的幸运。这种高度求之于智慧与悟的方式，正是与中国哲学精神一脉相传的。如果以为禅宗是佛一类（其实它已从佛教中独立出来），算不得是中国哲学，这真是想从鸡蛋中剔出一根骨头来。蔡仲德在评论冯友兰的“六书”时指出，“六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先生称之为‘新理学’体系……它无门户之见，而是‘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对理学与心学、气学，对儒家与道家、墨家、玄学乃至禅宗皆既有所取，也有所弃。”（参见冯友兰 1998：8）中国哲学的心胸如此之宽广，将气学与玄学都包括在内，为何怀疑禅宗是中国哲学的一部份？

退一万步说，就算将这种坚决拒语言文字于门外的极端态度不算中国哲学的主流，那么，“中国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状况，也就足以解释中国哲学为何未曾走向细密的语言分析一途：中国哲学以高度概念化、精神化、自省化、重视个人感悟为特征，这样一种哲学不必求助语言符号的运算。

老子虽然写了五千言，但他的主张“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的“道”就已不是那个原汁原味的“道”了。这种不诉求语言的态度，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之一。认为一落言诠就走样，这就种下了不必求助符号的种子。于是哲学不曾有什么语言性转向的事发生。

1.3 中国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不曾从汉语形式中求解过。我们已经知道，西哲的“是，诸是，所是，存在”（即所谓的“存在论”，最好的概括是“是论”）是从西语中盘旋出来的，汉语中不可能照样也滋生出一个“存在论”（即“是论”）来。但是，也可能有一种反驳意见认为，“白马非马”（冯友兰 1996：76-77）这个个案刚好证明了中国哲学对汉语形式的相当的关联，怎么能说中国哲学未曾发生过在汉语形式中求解问题的研究呢？请注意，我说的不是笼统的“中国哲学”，而是专指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人文精神，天人合一，价值论，人生意义。它们虽然同汉语密切相关，却不是从汉语的形式中萌发的，因而也未发生过从汉语形式中求解的研究。但名实之辩这个个案，是可以从语言形式中求解的。必须说明，作为哲学，中国哲学当然可以从语言学的研究中得到好处，但确实未曾听说过有哪一位中国哲人从汉语形式中探求过天人合一、出世入世、价值论、人生意义的事实。

中西哲学中的“问题”与语言相关的程度和状况是大有差别的（Russell, B. 1946）。

二、西方哲学走上细密的语言分析之路，自有它深刻的内存的因素推动。这大致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

第一个方面，语言性转向以后的哲学家认为分析语言就是在研究哲学，即研究他们情有独钟的“存在”论（更确切地说“是”论）、外部世界或者现实。这是西哲与语言分析纠缠的基本的一点。这一点，我已在“（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上）（下）”与“语用学的哲学渊源”（钱冠连 1999a, 2000, 1999b）进行了详细地讨论。这里不再重复。这个方面，可以用Dummett（1975, 1976）下面的一个断语作典型代表：区别分析哲学与其他学派两个信念是，第一，思想的哲学解释可以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获得；其次，对于思想的全面深刻地解释却只能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获得。

第二方面，西方哲学被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拖住，接受数学、科学知识的导向，而逻辑、数学等等必须让符号帮助，自然地走向了语言分析。西哲以高度符号化、逻辑化、严密的形式论证为特征，这就播下了它走向语言分析的种子。于是有了语言性转向。下面是西方哲学被逻辑、科学、数学引入语言分析的例子。

例子之一：Gottlob Frege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奠定基础的人物，对语言哲学有全局性的影响（参见Sbisa M. 1995:29）。分析他的工作，对回答为何西方哲学走向语言分析，颇具代表性。Frege尝试将算法还原为逻辑，为形式逻辑与数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的逻辑概念引导他研究某些概念（如意义概念），而这些概念又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关于意义，他区分了含意与被指（sense and reference），所谓含意，即与符号相联系的语义内容；所谓被指，即这个符号所指向的对象（物）。他还最先使用了“语言之力”（force）、预设（presupposition）等概念，最

先处理了表达命题态度的句子的分析问题。在分析性的语言性转向的基础之上是一个基础概念，即被Dummett (1975, 1976) 称为“从心智中挤出来的思想” (the extrusion of thoughts from the mind) 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个概念的观照之下，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句子的含意而且被一个心智行为所抓住，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心智内容，因为含意（与主观的表达相对）是可进入交际过程因而是客观的。这样的信念就使概念与命题分析获得了一个非心理的走向。在分析哲学家中间，这个方向很快地变成了语言的走向。分解句子就要相应分解它所表达的思想，这样一来，弄明白一个思想结构就得弄明白相应句子成份的语义上的相互关系。这一段话几乎是弄明白语言哲学是何物的一把钥匙。这里且不去提它。我们感兴趣的只是Frege就这样地被他的算法、数学、逻辑引到了语言分析上面来。

例子之二：20世纪初叶，英国哲学中最为走红的一种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 (ideal metaphysics)，但G. E. Moore and B. Russell却不肯就范，与其分道扬镳之后，走向分析哲学之道。他们两个人，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有兴趣寻找命题，命题的真值是可以被确知的东西。Moore为关于物质的常识知识辩护，而物质是外部世界的存在。Russell感兴趣的是数学与逻辑的命题，是科学知识（又是逻辑、数学、科学！）。他们二人都将他们的研究与命题分析联系起来，命题的真值又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Moore认为他能够证明，某些常识的命题是确知的真值，但是他也认为，命题的意义的分析是一个棘手的哲学问题。从Frege那里等到灵感的Russell进行了数学语言的分析 (Russell 1903; Russell & Whitehead 1913)，也处理了许多与逻辑相关的语言的诸问题，如包含外延词组 (denotative phrases, Russell 1905) 的命题的分析，后来，外延词组一直被认为是分析意义上的“哲学范式”。Moore (1966) 在其《哲学教程》 (*Lectures on Philosophy*) 中区分了两种哲学问题：(1) 一类问题是以具体的词语与普通用法中的词组或表达形式表示的东西，它们是分析的实体；(2) 另一类问题是作为整体的世界，世界的某些东西是可以由哲学分析处理的，而世界的另一些东西需要其他的论证程序。从上面的交待我们可以看出，导引他们走向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是很清楚的一条数学与逻辑的路线。

例子之三：Ludwig Wittgenstein (1922) 认为，在命题共有它们的逻辑形式的范围之内，命题是可以描写事实的：这样一个逻辑形式本身却是不能被描写的，它仅能被命题所显示。日常语言 (ordinary language) 常常不能让我们看清复杂命题的逻辑形式。但是，通过分析复杂的命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命题，它们的逻辑形式是明白的。他还宣称，只有陈述了某些有意义的东西的命题才是自然科学的命题。按他的观点，逻辑与数学的命题总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却陈述不了什么事情，因为它们不过是同义重复 (tautologies)。对比而言，哲学命题是无内涵 (nonsensical) 的，因为它们企图说出那些不服描写的东西；于是，它们冒犯了语言的界限。可以看出，Wittgenstein是在和逻辑形式、数学一起打滚，他就不能不反复地和命题、陈述打交道。他不走向语言反倒是奇怪的。不过，后期的Wittgenstein有了重大的变化。从1929年维氏在牛津大学执教以后便开始改变他的哲学视角，批评自己从前搞哲学的路子。他宣称，哲学不过是以语言为手段玩的智力魔术，误解了我们所用语言的语法之后产生的迷信。

例子之四：在维也纳，某些对逻辑思想与科学思想感兴趣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与另一些科学家与数学家联合，于1928年组成了维也纳小组。Rudolf Carnap是其中成员之一。他们的哲学倾向被人称为逻辑经验论或者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empiricism or logical positivism)。逻辑经验论者提出了一个意义标准，称之为可检验性原则 (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命题的意义存在于可检验的方法之中。这个原则包括了拒斥形而上学与分析的约束机理，该原则按照明晰的规则与科学的语言构思，作为转换与结构的基础。他们的哲学变成了科学的逻辑，即对句子、术语、概念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Rudolf Carnap对分析哲学的后来的发展最具影响力。他的语言哲学中，起初是关注逻辑句法 (Rudolf Carnap 1934)，认为它的特点是语言的纯形式理论；后来，他涉足语义问题 (Rudolf Carnap 1947)，将Frege的含意与被指的区分改造为语言表达式的外延与内涵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的区分，大致上勾画了形式逻辑 (modal logic) 的框架。请注意，从他的哲学倾向 (逻辑经验论或者逻辑实证主义) 到他的哲学变成了科学的逻辑 (即对句子、术语、概念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到他的逻辑句法 (语言的纯形式理论)，无一不是与逻辑、纯形式相连的。这样的哲学还能不进行细密的语言分析吗？而且，一个哲学学派明明白白地变成了“对句子、术语、概念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那已经不是与语言妞妞捏捏沾边的问题了。

例子之五：即使是不以逻辑形式为主要特点的牛津学派的哲学家们 (他们将哲学研究往日常语言的调查方面发展，他们感兴趣的是描写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比如人们称Austin J.L. 是战后“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最有影响的代表，即可证明他们的兴趣点何在。Sbisa M. 1995)，也不免提起逻辑。比如，Strawson, P. F. 是从日常语言的角度处理逻辑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论证的是，形式逻辑在评估脱离语境的语篇 (context-free discourse) 中是有用的，但是需要日常语篇的逻辑补充之，因为形式逻辑无力对付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又比如，提出著名的“话语中说出来的东西与对话中所暗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的Grice H.P. 那个系列讲座的题目就叫做“会话与逻辑”，也免不了从逻辑出发。

必须说明的是，在分析哲学家中，并非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能接受日常语言学派的方法。1960年以后，日常语言哲学派别急骤衰败，同时兴起人工语言构建之风。人工语言不仅用来分析科学语言，也用来作为任何关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形式基础。但是，六十年以降，已创建的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尖锐对立软化了下来，认为形式语言能够处理自然语言的倾向开始抬头。如Quine W. v. O. (1953, 1960)，Kripke S. (1972)，Montague R. (1974)，Donald D. (1984)，Dummett M., Putnam H., Searle J.R. 这些这些哲学家，才对严格的形式逻辑有所离异与松弛，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常常发现许多逻辑的形式论证。

上面的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种哲学诉诸高度符号化、逻辑化、严密的形式论证，它就不可能不走向语言分析。语言分析只是符号分析的一种。

第三个方面，西哲研究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是，诸是，所是，存在”，就是从西方语言盘旋出来的。拙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用大量的事实（第一章、第二章）说明，西哲的第一个阶段之所以称为ontology（“是论”或“存在论”，“本体论”这个译名不妥），就在于这种哲学盘旋的基础，最直观的就是：on/ to be, being, Being/ sein, Sein, seiend, das Seiendes。希腊文on（相当于英文中的being），英语being（分词），Being（动名词），德语sein（动词不定式），Sein（动名词），seiend（分词） das Seiendes（由分词转化成的名词）。

结论：

一，西哲与中国哲学的侧重大致上可以说，以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来看，前者是重外部存在或重存在（英文试用being-centric）的哲学（本文无法展开，请见结论之二的简短说明），而后者是重人（英文试用human-centric）的哲学（重人生，重人文精神，重天人合一）。从两种哲学的方法论看来，我们可以把西方哲学称之为重形式与逻辑（英文试用sign-dependent）的哲学，将中国哲学称之为重感悟（英文试用apperception-dependent）的哲学。这是我们从中西哲学的不同的语言走向的分析中得到的一个关系到双方根本性质的认识与区分。两个不同的偏重对各自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见结论之三与四）。

二，关于西哲“重外部存在”的一点说明：本文对西哲的重形式与逻辑、对中哲的重人与重感悟，都有具体的分析，唯对西哲的重外部存在，却因篇幅的限制无法展开。请参见拙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第一章与第二章的全部内容。本书第一章与第二章的全部内容都在支持这一结论（重外部存在）。西哲虽然也讨论人的智慧，但主要兴趣偏重于外在于人的世界，客观世界，即他们所说being我们所译成的“存在”。我们看一看西哲中用得最多的几个术语——being, ontology（即所谓“本体论”，其中，希腊文ont-【on的变体】就相当于英语中的being），entity（实体），object（对象），world（世界），reality（现实或实在），existence（存在）——便知道他们的这种兴趣偏重真是如此。

三，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重形式与逻辑（诉诸语言），研究对象上重外部存在，这样的副产品是产出了很多的著作与大量的哲学名家。大量著作虽然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歪曲了哲学精神，却总有一个被歪曲了的东西在那儿——一部一部的大部头著作，供人研讨，思路越来越开阔，变换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西方哲学比较容易走向平民。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的逐渐发达，与哲学方法论上重形式与逻辑与研究对象上重外部世界有一定关系。

四，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重感悟，研究对象上重人生与人文精神，不在符号上显现，容易产生玄想，不易传播，中国哲学虽然深刻，却难以走向大众。近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落伍，与哲学方法论上重感悟与哲学研究对象上重人生与人文精神有一定关系。

最后要指出的是，能不能说，走向了语言分析的哲学就比没有走向语言分析的哲学更高明，或者反过来说，后者比前者更深厚？答案是否定的。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主要兴趣与主要讨论对象，这与孰优孰劣无关。

2001/1/23

Carnap, R. 1934. *Logische Syntax der Sprache*. Wien.

——— 1947. *Meaning and Necessity*. Univ. of Chicago Press.

Donald, D. 1984.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 Press.

Dummitt, M. 1975.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part 1) In S. Guttenplan (ed.)

Mind and language: 97-138. Oxford Univ. Press.

——— 1976.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part 2) In G. Evans & J.

McDowell (eds.) *Truth and meaning*: 67-137. Oxford Univ. Press.

Kripke, S. 1972. Naming and Necessity. In D. Davidson & G.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2nd ed.) : 253:355. Reidel.

Montague, R. 1974. *Formal Philosophy*. Yale Univ. Press.

Moore, G. E. 1966. *Lectures on Philosophy*. Allen & Unwin.

Quine, W. v. O. 1953.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Quine, W. v. O.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vard Univ. Press.

——— 1960. *Word and Object*. MIT Press.

Russell, B. 1903;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05. On Denoting. *Mind* 14:479-93.

——— 194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apter 20) ,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 & Whitehead, A. N. 1913 *Principia Mathematica*. Cambridge Univ. Press.

Sbisa, M. 1995.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Handbook of Pragmatics Manual*, Jef

Verschuren, Jan-ola, Jan blommaert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Wittgenstein, L. 192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或者参见: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郭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冯友兰 1996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9月第二版。

——— 1998 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M], 北京: 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

钱冠连 1999a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上)[J], 外国语,

1999(6)。

—— 1999b 语用学的哲学渊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6)。

—— 2000。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下)[J], 解放军外国语

学院学报, 2000(1)。

—— 2001。不当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2)

转引自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大 中 小】【关闭】



• 上一条: 已经没有了

• 下一条: 1984-2002年《福建外语》总目录A (4-17)

相关专题: 无

相关信息: -

尚无信息

- 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 (5-7)
- “一语双文”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困难一简 (5-1)
- IT-常用词汇 (3-18)
- 四大名著的外文译名 (1-20)

>>更多

关于本站 站长信箱

版权所有: 语言学守望者 2004-2008

2004-2008 enterwang.com. All Right Reserved. 宁ICP备05001070号